

彻底批判反动小说

革命大批判文选

辽宁省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1 ）

“劳资合作”见鬼去！ 广州綢麻厂工人 向阳（ 16 ）

丑化贫下中农就是为机会主义路线翻案

——评欧阳山捏造的“贫农形象”胡源

.....博罗县黃山洞大队 李清 陈河清（ 18 ）

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评《上海的早晨》

.....丁学雷（ 21 ）

一部狂热鼓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反动小说

——批判《战斗的青春》

.....冀向东（ 34 ）

黄雀岂能比雄鹰.....解放军某部 红雷（ 44 ）

陈登科刮的什么风，打的什么雷？

.....上海县虹桥公社小闸大队（ 47 ）

粉碎反动的“顶风”精神

——批判反动小说《风雷》

.....上海师范学院 郑甫铸（ 50 ）

批臭呼妖风化黑雨的《东风化雨》

..... 上海轮胎二厂政工组 (52)

《小城春秋》是叛徒的“春秋”

..... 上海东风雨衣染織厂 云水怒 (55)

巴金为地主少爷涂脂抹粉用心何在？

.....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女工 撒兰英 (59)

阶级斗争在继续..... 丁学雷 (62)

——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

並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方晖 (74)

——再评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87)

——国棉二十一厂工人批判《上海的早晨》和

桑伟川反动谬论的座谈纪要

翻案狂的悲鸣..... 肖斌 (94)

《文汇报》编者按..... (98)

附录：

一、评《上海的早晨》..... 上海市煤气公司 桑伟川 (100)

——与丁学雷同志商榷

二、桑伟川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 (108)

为 错 误 路 线 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
“来龙去脉”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五年前，围绕着对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的评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当时就看出《一代风流》是腐蚀群众特别是腐蚀青少年的大毒草，奋起口诛笔伐；刘少奇一伙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则慌忙跳出来压制和围攻。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亲自出马抚慰欧阳山：“你吃了亏”。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公开扬言要做欧阳山的靠山：“有我陶铸在，欧阳山就不会倒。”欧阳山在这些黑后台的支撑下，狂妄地叫喊：他“第二世也不服”。

请同志们注意：在这里，欧阳山宣布了他所代表的阶级——资产阶级，还要同无产阶级作长时期的、几“世”的较量。可见，在文艺界，在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

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刘少奇一伙看中《一代风流》是有原因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一代风流》就是“专写错误路线”的反动作品。对这样一个作品进行再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毛主席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现在，就让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来解剖一下《一代风流》及欧阳山的其他作品，看看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究竟是为哪条路线服务的。



欧阳山在谈《一代风流》的创作时自我标榜道：到了解放区经过整风以后，“我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想到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

要说明“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光辉著作，彻底批判了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我党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以后，毛主席的这条正确路线又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刘少奇等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断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可是，《一代风流》是根据什么路线来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呢？

贯串《一代风流》的主线，是共处于一条小巷之中的三个家庭：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官僚地主阶级的何家，工人阶级的周家。以这三个家庭为中心，联系到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人物，意图构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遵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按照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或现状，在这条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小巷中，将会出现多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啊！但欧阳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你看，在他的笔下，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早已被温情脉脉的邻里、亲戚、爱情的关系所淹没，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斗争，也已为端午、乞巧、中秋赏月、春日郊游等等所谓“优美的南方风俗画面”所代替。这样的“蓬莱仙境”，根本不可能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找到，它只能存在于作者的主观臆想之中。作者臆造出这条“三家巷”来歪曲现实的阶级关系，完全是为了美化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反动路线的需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抗。

在《三家巷》中，欧阳山精心编造了买办资产阶级陈家小姐和“共产党员”周榕，用恶意的口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反动情节。一个高声狂叫：“一个社会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一个随声附和：阶级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大约是时隐时现的东西”。真是“说不清楚”吗？不。《一代风流》中为地主资产阶级及反映他们利益的错误路线大肆吹捧、树碑立传，这一黑线是十分露骨的、十分“清楚”的、贯串全书而决不

是“时隐时现”的。

《一代风流》的第一卷——《三家巷》反映的，正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这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生死搏斗的时期，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极其激烈的时期。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根据这个科学的分析，反映这一阶段历史的革命文艺作品，理应象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所创造的革命样板戏那样，塑造和歌颂革命的暴风雨中工农兵的革命英雄形象，典型地概括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真实地反映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显示中国革命只有坚决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欧阳山却完全相反。在《三家巷》里，他通过书中周家兄弟的一段谈话，来表现他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革命前途的看法。“共产党员”周榕满腹牢骚地说：“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另一个“共产党员”周金先是暴跳如雷：“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

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接着又灰心丧气：“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这时，周榕对国民党的“满腹牢骚”忽又变作“满腹希望”：“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看，这就是欧阳山笔下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心目中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竟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倒是国民党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场革命中只是一名“吃小份儿”的，“抬轿子”的，“扛活儿”的！这不是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阶级关系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拱手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让给人民公敌蒋介石了吗？这些“共产党员”对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革命前途，一会儿消极悲观，认为革命是“没有指望的了”；一会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和汪精卫身上，认为我们只能“忍耐着瞧”，向国民党蒋介石屈膝投降。这是什么人的观点？这是陈独秀的观点，即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

《一代风流》的第二卷——《苦斗》反映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广东地区的农村斗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向。但是，欧阳山根本不去表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

路，却通过“十大寇”和一些游魂似地飘来荡去的“共产党员”，放肆地鼓吹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调调。这些人先是盲动主义，念念不忘“攻打仙汾市”、“打进广州城”，说什么“只有占领了广州，夺取了政权，全省的工人、农民才能得救。其他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鼓吹“胜利，它总是突如其来的。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后是悲观主义，呼天抢地地绝望叫喊：“失败了，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自称参加了延安整风“明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欧阳山，难道不知道毛主席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吗？难道不知道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部伟大著作中提出的“肃清盲动主义”“肃清流寇主义”“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教导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故意歪曲党的历史，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为错误路线翻案。他企图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二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理想，总是通过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首先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来表现的。

《一代风流》中的“风流人物”是谁呢？第一名当推周炳。他是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刻划、竭力美化和歌颂备至的主人公，是表现所谓“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理想的“革命英雄”。

周炳何许人也？此人咀巴上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一个投机分子，是混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叛徒和工贼，是作者狂热地宣扬“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典型形象。

在《三家巷》中，参加省港大罢工工人的游行，是周炳的第一次投机革命。他身在游行队伍之中，心却在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美人儿”区桃身上。帝国主义的子弹射穿了区桃的胸膛，他就一下子从狂热变成了冰冷，从无限止的“自我扩张”跌进到无边的虚无之中。在他的心目中，整个世界只能为他和区桃而存在，而区桃也只不过是占有和享受的对象。因此，归根到底，世界就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奉行这样一种极端利己的唯我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他可以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去投机革命，也可以为着同一目的而出卖革命。因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炳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却为了追求买办资产阶级小姐陈文婷，不顾旁人的一再警告，连续发出了一封又一封的所谓情书，断送了“共产党员”周金的性命，甚至把地下兵工厂也向这个买办小姐告密！

周炳的第二次投机革命，仍然是抱着为个人复仇的目的而卷进了广州起义的。起义失败，个人的“一切美丽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于是又被“痛苦、寂寞和悲愤缠绕着，挣不脱身”，大叫“无产阶级革命就算完结了！”并且可耻地接受了曾被他骂为“工贼”、“内奸”的陈文雄、何守仁的施舍，坐船逃到上海，躲进“金鑫里三号”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子豪的公馆当寓公，跟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太太陈文英过着不明不白的暧昧生活。欧阳山特意为他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安排了这样一段经历，他究竟想歌颂一类什么样的人，宣扬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苦斗》中，周炳带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太太陈文英

的介绍信，到震南村开始了第三次投机革命。“革”的什么“命”呢？当了“第一赤卫队”的政治指导员，一面唱着“左”倾盲动主义的高调，一面又亲自从水底救了地主、买办、官僚、党棍何守仁、陈文雄、张子豪、李民魁等人的狗命，还凭着这点“救命之恩”，二次进城向何守仁乞求恩施，最后又钻进了他认为是“腐败、肮脏、混乱、荒唐”的三家巷，接受陈、何两家的庇护，俯首贴耳地成为地主、买办阶级共同豢养的一条小走狗！

从投机革命开始，到悲观绝望、叛变投敌告终，三次“革命”，三次背叛，这就成了周炳“革命”的三部曲。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周炳这类人物倒也并不罕见。每当革命巨流滚滚向前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残渣烂草夹杂其间，革命进入高潮，他们浮上浪尖，昂首翘尾，简直比革命还要“革命”；一旦革命进入低潮，马上沉淀下去，恬不知耻地投入反革命的怀抱。这类被欧阳山歌颂为“一代风流”的人物，分明是道道地地的一代渣滓。

欧阳山为了神化他所理想的周炳这个叛徒、工贼形象，在书中竭力颂扬所谓“美的魔力”。在遭受着三座大山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周炳凭着一副“好容貌”，居然不仅可以做地主、买办、官僚政客的堂上客、座上宾，而且是夫人小姐心目中的“王子”和宠儿，难道“美”的作用真是那么神奇吗？鬼话！实际上，这不过是用来掩盖周炳叛变革命、投降地主资产阶级的障眼法。在阶级社会里，美同爱都是有阶级性的。买办资产阶级小姐陈文婷在讲到周炳的哥哥周榕时就曾赤裸裸说过：“他要把我们当做敌人，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其实，周炳和周榕一样，不仅是地主资产

阶级的俘虏，而且是他们忠实的奴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投机革命而又叛卖革命，对于革命阵营来说，固然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而对于反动阶级来说，却起到了他们自己所不能起的反革命作用。这才是地主、军阀、官僚、买办所以如此欣赏周炳的真实原因。

这种通过对异性的“美的魔力”的描写，来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是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作家早已用滥了的卑劣手法。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中，不是就大量充斥着通过对立阶级男女的“一见钟情”，来宣扬劳动人民只有背叛本阶级、投靠反动统治阶级才是自己唯一出路的恶毒描写吗？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作品中，不是充斥着诸如那种为了一双蓝眼睛就可以把肉体 and 灵魂统统出卖给反革命之类的反动情节吗？事实证明，欧阳山只不过是跟在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作家屁股后面的一个可怜的爬行者而已！

欧阳山曾经自鸣得意地同别人谈到《三家巷》与《红楼梦》的对比，认为它们的不同之点仅仅在于：“第一，《红楼梦》里没有闹革命，也不谈打仗；第二，《红楼梦》里也没有那么多广州话。”这是无耻地歪曲古人以吹捧自己。两者根本不能相比。《红楼梦》支持了十八世纪中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三家巷》和《苦斗》却是支持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投降者。如果《红楼梦》曾经起过揭露地主阶级内部黑暗、腐朽、没落的作用，那末，《一代风流》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它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都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这难道还不清楚

吗？

三

欧阳山在《三家巷》和《苦斗》这些自称是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作品中，不表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专写“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不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却专门歌颂叛徒、工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正是反映了他一贯的阶级本性。《三家巷》和《苦斗》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的暴露。不是还有人曾经认为欧阳山炮制《三家巷》和《苦斗》的“动机”还是好的吗？有些不了解底细的天真的人们不是还曾经认为欧阳山是个“老革命”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通过欧阳山一生的主要作品，看一看他本人的“来龙去脉”。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欧阳山以罗西的笔名刚走上文坛的时候，就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美化革命阵营中形形色色的叛徒、工贼。他笔下歌颂的人物，其卑鄙的程度，据他自称“怕未必让张资平氏专美于前”。正是由于这一点，欧阳山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青睐，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成为专写反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人物的“专业作家”。

欧阳山不是吹嘘自己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国民革命军里做些政治教育工作”了吗？不错，他同精心塑造的周炳这个人物一样，曾经被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风暴卷进了大革命的洪流。但当蒋介石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革命烈士的鲜血还在蒋介石屠刀下流淌，他却完成了一部以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玫瑰残了》，向刽子手去邀宠。他公然在《后记》中自

供道：“做完这篇长篇创作以后，或许不久就要跑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当中尉编辑”去了！第二年五月又写了《桃君的情人》，不仅无耻地歌颂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头子，而且还借书中另一所谓正面人物“P君”极其反动地大骂：“把性命做工具，这完全是共产党的行为！”欧阳山咒骂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无数先烈，这恰恰证明了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反共宣传的“工具”。他的所谓“政治教育工作”，原来就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欧阳山早在一九二八年写成的《爱之奔流》的序言中，就曾公开宣称他反对无产阶级政治。他说：“政治这个东西是未必能解决一切纠纷的”。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解决一切纠纷呢？他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找到了这个答案，这就是胡风后来提出的“原始的强力”和“疯狂性”、“痉挛性”。欧阳山用自己作品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以后不久，就结识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胡风，这可真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从此，欧阳山在他的反革命创作实践中，完全遵照着后来由胡风提出的“精神奴役创伤论”这种反动文艺理论，成了一名忠实地实践周扬、胡风反革命理论的“作家”。

在这个时期中，叛徒、工贼经常成为欧阳山小说的“理想英雄”。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短篇小说《康波父女》，一九三六年写的短篇小说《失败的失败者》，就都是以工贼和奸细为主人公的。前者竭力歌颂和渲染康波的孤傲性格，把他的出卖工人运动说成是完全值得同情的，而那些谴责康波叛卖行为的工人们倒是不通情理的，是欺弱怕强的“孱头”。后者则描写职业奸细郭胜锐临死前突然天良发现，发

出“懊丧地追悔的、濒于灭亡的呻吟”，发誓“下一辈子投生”要给被他出卖了的革命者“做牛马”！对这样一个极端卑鄙、狡猾的敌人，欧阳山竟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怜悯！

欧阳山这些反动作品，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支乔装着革命面目的别动队，其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也是反对文化革命新军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的。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后不久，他假惺惺地打着“纪念鲁迅”的旗号，在“哀痛”中抛出了中篇小说《鬼巢》，但它却是一篇典型的胡风式的作品。这部作品让在广州起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几百个“鬼魂”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疯狂性”、“痉挛性”，莫名其妙地“殴打，斥骂，调情”，“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用可怕的野兽般的喉音咆哮起来”……这是在“纪念鲁迅”吗？不，这是对伟大的鲁迅的污蔑！

在抗日战争时期，欧阳山大肆鼓吹和积极创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国防文学”，反对鲁迅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革命口号。他通过一系列的“作品”，鼓吹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进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宣传。欧阳山在参加延安整风后写成的长篇小说《高乾大》，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它违背毛主席一贯的教导，片面强调农村合作社要保证农民“发家致富”和“将本求利”，把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边区农民写成是一群浑浑噩噩的可怜虫，面临着日、蒋、汪对边区的包围，却丝毫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只有“红利”两字。书中的主人公高乾大，竟被写成是一个带有“精神奴役创伤”的

共产党员，怕鬼怕得出奇，几乎成了一病不起的精神分裂者。这难道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解放区的贫雇农的形象吗？

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欧阳山一面公开扬言要为文艺黑线抓“干部、金钱和摊子”，扩大实力；一面继续拚命赶制《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等毒草，为贯彻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舆论。他在一九五九年抛出的那本专写广州起义的历史小说《红花冈畔》，不仅明目张胆地抹煞和贬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了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不憚其烦地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树碑立传，一本四万字的小小说吹捧陶铸竟达六次之多。直到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他肆无忌惮地抛出了《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这样一些毒草小说，疯狂攻击大跃进搞糟了，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公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鸣“不平”，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鸣锣开道。这些作品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在当时曾博得周扬等反革命分子的大声喝采。

作品是作家的一面镜子。我们从欧阳山成堆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欧阳山的真面目：从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欧阳山一贯顽固站在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立场上，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铁证如山，赖得掉吗？

欧阳山的反动作品，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社会渣滓为生活源泉，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的黑暗、腐烂的

精神面貌，是一种道地的流氓文学即工贼文学。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欧阳山在《七年忌》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叙述自己阶级出身的文章，叫做《我与文学》。他谈到他的从小官僚沦为赌棍的父亲，谈到他自己从小在广州这个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思想十分浓厚的都市中长大，“过着下流顽童底放荡生活”，阅读了大量颓废色情的封建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他的朋友“有嫖赌诈骗的无赖汉”，“有在山脚挖洞，做旅店营业的老板”，“有画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墙上放马的伏卒”，还有“私娼底弟弟”，等等。总之，这是一伙随着时势浮沉漂荡的灰色杂乱人群，他们是欧阳山笔下最心爱的人物。

欧阳山在其中生活过和进行热烈歌颂的这个社会阶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他们极易投机革命，也极易叛卖革命。叛徒、汉奸、特务王明就是这种渣滓的一个代表。欧阳山却把这些“渣滓”，一个个当作“英雄”来歌颂。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为着巩固自己的政权，或者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都需要制造反革命舆论，特别需要在无产阶级内部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反革命舆论，鼓吹美化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的反革命舆论。按照这个反动的政治标准，欧阳山的作品，当然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想的选择对象。正因为这个缘故，当蒋介石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间发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时候，当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遭受迫害屠杀的时候，当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书籍遭到查封查